

#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 中国低生育率<sup>\*</sup>

计迎春 郑真真

**摘要：**为了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全面两孩政策的接受度、影响和实际效果以及中国生育率的长期走向，有必要从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情境出发，综合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来理解我国低生育态势背后的复杂社会机制。借鉴国际理论和经验教训，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审视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可以发现，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关键；设计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推动政府、社会、企业界和男女两性的多元主体参与是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机制；提倡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摒弃传统儒家父权思想和家族主义思想，是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意识形态基础。鉴于女性的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促进公私领域性别平等的同步发展，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将会对维持一定的生育率和经济发展都有积极贡献。

**关键词：**社会性别 经济发展 低生育率 全面两孩政策 工作—家庭冲突

作者计迎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 一、问题背景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两年后，如何理解民众对政策的反应和评价政策效果成为关注焦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数在总量上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相比有所上升，2017年的二孩出生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同时一孩出生数量比2016年少了249万人。<sup>①</sup>由此可见，生育政策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5AZD080）和上海市教委东方学者特聘教授项目（No. TP2015032）的资助。感谢 Peter McDonald 教授对本研究的启发，感谢杨双双同学对本文初稿的修改建议，也感谢外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 李希如：《2017年我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继续显现》，2018年1月20日，<http://>

调整明显推动了二孩出生。但二孩出生的增加幅度远不及此前所估计的增量，也低于一孩出生的减少量，这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所能释放的生育潜力未达预期，且明显后继乏力。在20多年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的情况下，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是否能有效地影响民众的生育决定并产生长期效应，目前还很难论断。对于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和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效应，虽然不乏各种解释和讨论，但我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同时具有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女性面临的困境和抉择。生育政策调整后，她们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是工作与育儿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尽管已有学者从性别角度讨论生育政策调整及相关公共政策对女性的可能影响，思考和反思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缺位，<sup>①</sup>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无论从学术还是政策角度，都需要对此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思考。

低生育率现象并非中国独有，21世纪末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了生育率降低的趋势。随着国际人口学界对低生育现象的理解逐渐加深，尤其是近20年来一些深受传统儒家父权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先后进入超低生育率行列，而政府所采取的各种干预政策并未出现明显效果，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生育研究由此日益受到重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学者开始借助社会性别视角来理解和解释低生育率现象。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性别不平等的机制和变化更为复杂，随着公私领域分离趋势的加剧，<sup>②</sup>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日益尖锐。因此，为了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全面两孩政策的接受度、影响和实际效果以及中国生育率的

www. stats. gov. cn/tjsj/sjjd/201801/t20180120\_1575796. html, 2018年1月20日。

- ① 参见叶文振：《“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女性学思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2期；郑真真：《从家庭和妇女的视角看生育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2期；赵梦晗：《全面二孩政策下重新审视公共政策中缺失的性别平等理念》，《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
- ② “公私领域分离”出自女性主义理论，主要指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家庭经济模式衰退，男性逐渐参加有酬劳动，其工作场所远离家庭，而女性的活动则主要局限于私人家庭，尤其要从事家务和照料等无薪劳动，从而构成并加剧了性别平等在公私领域的不均衡发展。本文所说的公共领域主要指承担物质生产（有酬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市场，而私人领域则指承担社会再生产（如子女和老人的照料、家务等活动，往往无酬）的私人家庭。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追逐效率和利润的同时，单位进行“减负”，以前由单位承担的社会再生产的职能逐渐回归个体家庭，并主要由女性来承担。这样就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物质生产功能和私人领域的社会再生产功能日益分化，工作女性需要同时承担物质生产职责和社会再生产的大部分职责。参见 Yingchun Ji et al.,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vol. 77, no. 11-12, 2017, pp. 765-778; 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长期走向，有必要突破传统框架，系统地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理解和研究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

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指标包括居民收入等都远低于其他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与福利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也与之有一定差距。在分析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和讨论应对策略时，必须兼顾经济发展维度。女性的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也使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和生育三者密切关联；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可以形成正向良性反馈机制——性别平等的提高可以推动女性全面、高效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并有助于维持一定水平的生育率；而对三者关系处理不当，则可能形成负向恶性抑制机制，对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和生育率都形成负面作用。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情境出发，借鉴国际前沿的人口理论，分析世界上其他低生育率社会的得失，提出综合考虑社会性别和经济发展的视角，以此来理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口转型同步进行的情境之下，我国低生育态势背后的复杂社会机制，并进而理解生育政策调整后人们相应的生育决定和行为以及未来变化，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生育率变化态势和未来的走向。

## 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现象

### （一）中国生育率下降及主要推动力

20世纪末我国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过渡的人口转变，目前已位于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人口变化总体趋势呈现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特点。中国的生育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政策期间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70年代初的6左右下降到80年代的接近人口更替水平，在90年代再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此后进一步下降到2000年的1.5左右，并持续至今。<sup>①</sup>2000年以后，不同地区、城乡、民族间的生育率水平差异明显缩小，均趋向于更替水平之下。

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生育政策驱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方面。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实施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且两者都在较短时期内经历了较大幅度的重要变化，更增强了生育率下降影响因素研究的复杂性。宏观层面的研究发现，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尽管各地具体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有所不同，但是不同省份之间的生育率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

<sup>①</sup> 参见郭志刚等：《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异相对一致。<sup>①</sup>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因素作用逐渐大于政策因素,如对2000年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分析发现,县级生育水平差异的一半可以直接归因到社会经济发展因素,而只有约10%可以归因到生育政策因素。<sup>②</sup>此外,亦有学者指出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生育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例如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生育政策在较短时期内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理想家庭规模。<sup>③</sup>

虽然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有众多研究,但是现有研究仍受条件局限。首先,生育率在相对较短时期内快速下降,但相应的研究并未及时跟进。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与其他同期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则出现了快速转变,生育率下降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被大大压缩,<sup>④</sup>以至于关于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讨论余音未了,持续数年的低生育率已成事实,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开始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sup>⑤</sup>其次,中国人口学建设起步较晚,且围绕生育率下降的研究一向以定量和宏观研究为主,主要以西方解释高生育率或第一次人口转变的传统人口学理论为依据,应用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相关理论或其他相关学科的参与以及微观层面的研究都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对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下降机理的全面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生育率下降的相关研究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缺位,而这一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为目前国际人口学解释低生育率的主流理论取向。由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执行规定相对明确的生育政策,这些政策往往被视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动力。而作为生育决定和行为直接承担者女性则容易被视为政策执行或避孕节育服务的被动接受者,从而使得女性的主体作用和个人主观动机被忽视。这一局限严重影响了对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的理解和解释,并影

① 陈卫:《“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Jiajian Chen et al.,“Province-level Variation in the Achievement of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China,”*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 no. 3, 2009, pp. 309-328.

② 蔡泳:《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国际的经验和江浙的比较》,曾毅等:《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 Griffith Feeney et al.,“Recent Fertility Dynamics in China: Results from the 1987 One Percent Population Surve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5, no. 2, 1989, pp. 297-322; M. Giovanna Merli and Herbert L. Smith,“Has the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Been Successful in Changing Fertility Preference?”*Demography*, vol. 39, no. 3, 2002, pp. 557-572.

④ 李建新、涂肇庆:《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

⑤ 李建民:《中国的生育革命》,《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响到对整体生育政策思路的设计和评估，也必将影响对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判断以及与生育相关的政策调整、配套或衔接。

与之相应的是，既有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讨论中缺少的关键部分，是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现象。在与生育率转变相关的因素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直接影响家庭的生育需求和女性的生育决策。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成功地大幅度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生育效率的提高有效降低了个体家庭对生育数量的需求。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工业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普遍促进了城乡女性从事家庭之外的有酬劳动，使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如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估算，中国20—40岁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均在90%左右。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或者持平于很多发达国家。女性普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在决定生育和避孕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同时，由于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使得女性的育儿负担与劳动参与产生了冲突。这也正是中国城乡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响应国家“晚稀少”的号召，普遍采用避孕节育措施，从而导致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是，现有研究往往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干预的作用，忽视或低估了女性在生育率转变中的历史作用。

## （二）中国的低生育率和女性的劳动参与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跨入低生育率行列，生育率至今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种生育率水平低的现象不仅与夫妇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有关，也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和推迟生育密切相关。<sup>①</sup>而在生育水平长期低迷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呈缓慢下降趋势。<sup>②</sup>除了因经济转型导致的企业职工下岗以外，生育和养育子女是导致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主要原因，例如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而中断就业的比例从1981—1990年的10.3%提高到2001—2010年的36.0%。<sup>③</sup>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与低生育率的现象长期并存，原因之一是女性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是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冲突。

- 
- ① 郭志刚：《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4期；郭志刚、田思钰：《当代青年女性晚婚对低生育水平的影响》，《青年研究》2017年第6期。
- ② 吴要武：《剥离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城镇女性市场参与变化的解释》，《劳动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都阳、贾鹏：《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 ③ 黄桂霞：《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冲作用——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基础》，《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

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本由国家通过单位分担的社会再生产方面的职能和服务逐渐社会化，转移到个体家庭身上，而由于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方式的持续，最终主要还是由女性来承担，<sup>①</sup>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工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地位和双重负担，并进一步导致了她们日益激化的工作—家庭冲突。<sup>②</sup>这种结构性变革和宏观—微观影响机制塑造了中国工作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经历和婚育动机，大大提高了她们的生育机会成本，而最终影响了她们的生育决定和行为。对于广大农村女性而言，农村年轻劳动力普遍向城市流动从事非农就业，生育行为日渐与城市趋同，而流动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也与城市女性相类似。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的现象，<sup>③</sup>同样反映了女性工作—家庭冲突所带来的生育率走低的社会性后果。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鼓励女性参与劳动促进男女平等。但在某种意义上，女性是随经济形势波动的“劳动力蓄水池”，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劳动参与更容易受到社会历史转型的结构性冲击。<sup>④</sup>如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各界曾就有关“女性回家”和“阶段就业”展开过激烈讨论。<sup>⑤</sup>2014 年以来的生育政策调整为更多家庭提供了生育二孩的机会，但也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生育压力的讨论以及对政策支持呼吁。最近有研究发现，生育二孩对城镇青年女性的工作冲击最大。<sup>⑥</sup>生育政策调整后，如果缺少系统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的介入，女性很可能同时面临回家生育孩子的压力和更高的就业歧视及职场风险。如果女性就业受挫，不但影响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还会抑制女性实现生育意愿。中国多年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各种社会调查显示的意愿生育水平，一方面意味着现实

① Sarah Cook and Xiao-yuan Dong, “Harsh Choices: Chinese Women’s Paid Work and Unpaid Care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conom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2, no. 4, 2011, pp. 947-965.

② Yingchun Ji et al.,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pp. 765-778.

③ 李丁、郭志刚：《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3期；尹文耀、姚引妹、李芬：《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④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蒋永萍：《世纪之交关于“阶段就业”、“妇女回家”的大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2期。

⑥ 赖德胜等：《2016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性别平等化进程中的女性就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7—160页。

中的诸多因素抑制了人们实现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生育率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可能。但要使大多数育龄人群实现其期望的生育数量，需要有来自外部的社会支持机制，消减生育抑制因素的影响。

### 三、国际低生育率现象和相关理论

#### (一) 世界范围内的低生育率现象

近几十年来，很多后工业社会和新兴工业社会相继出现低生育率现象，据统计，2010—2015 年全球有 83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46%）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预计 2050 年之前将有 51 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生育率下降是 21 世纪的全球趋势，不同的是各国下降速度快慢不一。<sup>①</sup> 东欧、南欧和东亚一些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就已低于 1.3。这种超低生育率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和理论来解释低生育率现象。<sup>②</sup>

对欧洲低生育率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低生育现象在不同国家出现了分化，那些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传统价值观和家庭观念较强的国家，总和生育率远低于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传统家庭观念较弱的国家。<sup>③</sup> 一些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在 80 年代后期出现了逆转，而这个迷思引发了国际人口学界对于低生育率的大规模讨论，该逆转的背后似乎有着政府主导的家庭友好政策的影子。需要注意的是，在高生育率和生育率下降的情境下，女性教育、经济地位的上升包括女性的劳动参与被认为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低生育率的情境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进程相对滞后于公共领域，会显著影响女性生育行为，但这种影响难以直接用现有反映女性地位的宏观指标——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等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复杂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采取更加开

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Key Findings and Advance Tables," Working Paper no. ESA/P/WP/248, [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7\\_KeyFindings.pdf](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7_KeyFindings.pdf), 2017.

② Morgan 和 Taylor 曾对此有系统的综述，详见 S. Philip Morgan and Miles G. Taylor, "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2, 2006, pp. 375-399.

③ Jean-Claude Chesnais, "Fertility, Family, and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2, no. 4, 1996, pp. 729-739.

放的态度，对低生育率背后的复杂社会机制进行探讨。

有学者<sup>①</sup>对低生育社会中的生育率和家庭友好政策的交互关系进行分类后，发现当家庭友好政策着眼于解决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时，政策力度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在北欧国家，相对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并行不悖。法国和英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略低于北欧国家，但生育水平仍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在德国、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虽然传统家庭观念强，同时有育儿津贴和慷慨的母亲育儿假，但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均相对较低。比如1983—1995年，30—34岁年龄段的德国女性的经济参与率为57.8%，荷兰为43.1%，丹麦则为88.4%；而1995年这三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4、1.53和1.80。追根溯源，是由于德国、荷兰等国的相关政策固化了所谓男性养家糊口、女性操持家务的传统家庭模式。而在地中海国家，由于家庭友好政策相对缺乏，家庭安排模式非常传统，再加之长期低迷的经济形势，很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超低生育率长期并存。

超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当今东亚及东南亚一些工业社会的显著标识。林德法斯和金敏子<sup>②</sup>汇集了众多研究成果，主要从制度设置、历史传承、文化规范和政策取向入手，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低生育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评述。这些地区的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即总和生育率低于1.3）已经持续了较长时期，尽管各地政府不断推出旨在提升生育率的各种政策和办法，但仍缺乏实质性成效。以日本为例，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从更替水平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1.26，近年虽略有上升，也不到1.5。结婚率的大幅度降低是这一时期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因素，从1975—2010年，日本30—34岁未婚女性比例从8%上升到35%，35—39岁未婚女性比例则从5%上升到23%。<sup>③</sup>虽然日本女性在教育和职业上取得了进步，但是男性角色尤其是其家庭角色并没有得到重新定义。有学者<sup>④</sup>针对日本社会家庭内部的不对等性别关系提出了“婚姻包”概

① Linda Hantrais,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Policy and Changing Family Form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vol. 13, no. 4, 1997, pp. 339-379; 吴帆:《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Ronald R. Rindfuss and Minja Kim Choe,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Variations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③ Noriko O. Tsuya,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Japan: Patterns,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Ronald R. Rindfuss and Minja Kim Choe,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Variations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pp. 87-106.

④ Ronald R. Rindfuss et al., "Social Networks and Family Change in Ja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9, no. 6, 2004, pp. 838-861; Larry L. Bumpass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The Case of Japa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 no. 3, 2009, pp. 215-235.

念，即女性婚后需要承揽绝大部分家务以及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津谷典子把日本长期存在的女性晚婚和不婚现象归因于在日本女性教育和就业机会增长的同时，家庭中依然维持着严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日本女性一旦结婚就成为提供照料方，而男性则从接受母亲照料变成接受妻子照料。<sup>①</sup>另外，日本高强度的密集母职和竞争激烈的教育系统也给母亲们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日本社会的这种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其他亚洲社会。

亚洲的这些低生育率社会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的长期存在，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与家庭中的传统习俗发生交锋，导致女性面临较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育儿设施相对有限，女性不得不面临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不灵活、不友好的育儿假等工作环境，<sup>②</sup> 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等，大城市的住房问题也对婚姻和生育起到了抑制和推迟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对长期的低生育率现象高度重视，为了解决问题不断推出或更新各种政策和措施。如日本政府自1994年起针对低生育率问题提出支持育儿措施的“天使计划”等一系列对策、计划和实施办法，包括2002年开始的“等待入托儿童0人作战”计划，大力发展育儿机构，并由政府提供儿童津贴和对父母带薪产假的补助等，<sup>③</sup> 虽然政策实施后幼儿入托情况大为改善，但20多年过去了生育率仍未得到有效提升，同时日本女性产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进入家庭的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愿放弃事业的女性则不得不推迟婚育甚至选择不婚。如果从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评价，这些政策的效果不佳。从这些地区均高于更替水平的已婚生育意愿来看，如此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并不是夫妻的理想选择，而是被各种条件限制的选择。最为突出的限制包括：不利于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社会制度、市场制度以及传统的家庭模式和性别文化规范。有学者分析认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在性别平等方面已经卓有成效的国家如北欧国家相比，日本、韩国等国家在社会上、职场中，尤其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因而即使采取了诸多政策干预，仍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sup>④</sup> 此外，企业

① Noriko O. Tsuya,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Japan: Patterns,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Ronald R. Rindfuss and Minja Kim Choe,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Variations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pp. 87-106.

② Gavin W. Jones and Wajihah Hamid, “Singapore’s Pro-Natalist Policies: To What Extent Have They Worked?” in Ronald R. Rindfuss and Minja Kim Choe,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Variations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pp. 33-61.

③ 周云：《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人口学刊》2008年第5期。

④ Thomas Anderson and Hans-Peter Kohler, “Low Ferti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1, no. 3, 2015, pp. 381-407.

界对政府推出的支持育儿政策缺乏合作的积极性也是部分东亚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

近年国际上关于低生育社会的实证研究显示,经济发展和女性就业不一定是生育率回升的障碍,而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可能是低生育社会中兼顾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回升的机制。<sup>①</sup>国内也有学者在对欧洲育儿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后指出,“系统地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才能有效避免女性的职业发展风险,并使生育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sup>②</sup>

## (二) 解释低生育率的主要理论

在解释低生育的理论尝试中,制度冲突理论和性别公平理论是影响力最大的两个理论。制度冲突理论主要基于对欧洲不同国家的低生育率现象的研究,<sup>③</sup>认为各国的家庭模式和文化背景可能会影响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的效果。例如在一些传统家庭观念较强的国家,公共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养家糊口的传统(如德国)或难以改变传统的家庭安排模式(如意大利);而另一些西欧国家的公共政策则在注重个人权利和社会平等的同时,也能关注到女性的权利和多元家庭模式(如法国和英国),<sup>④</sup>因而可将生育率保持在1.7或更高。制度冲突理论主要关注女性的母亲角色和工作者角色的冲突,也就是育儿和有偿劳动之间的不相容性,认为工作—家庭政策、育儿安排、劳动力市场设置等制度性条件在结构层面上导致了性别角色的不相容性(即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sup>⑤</sup>

① Thomas Anderson and Hans-Peter Kohler, “Low Ferti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ity,” pp. 381-407.

② 吴帆:《全面放开二孩后的女性发展风险与家庭政策支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③ Karin L. Brewster and Ronald R. Rindfuss,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pp. 271-296.

④ Jean-Claude Chesnais, “Fertility, Family, and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pp. 729-739.

⑤ Ronald R. Rindfuss and Karin L. Brewster, “Childrearing and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2, Supplement: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Pattern, New Theories, 1996, pp. 258-289; Karin L. Brewster and Ronald R. Rindfuss,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pp. 271-296; Thomas A. DiPrete et al., “Do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Generat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Rat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 22, no. 5/6, 2003, pp. 439-477.

麦克唐纳在梅森的“社会性别系统”研究基础上,<sup>①</sup>从性别公平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制度设置的不相容性来解释生育率从更替水平向超低生育率的变化。<sup>②</sup>在低生育率社会里,个人导向的社会制度领域(如政治、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方面)性别平等水平高,而家庭导向的社会制度领域的性别平等水平相对较低,这两个领域的性别平等水平不同步导致了女性在工作 and 生活中的尖锐冲突,如女性在职场的成功和家务的繁重,导致她们把将来的家庭角色(如妻子、母亲等)视为对个人发展的拖累,因而选择了少生甚至不生或不婚。麦克唐纳进一步说明,缺乏性别公平视角的家庭友好政策会有损女性的社会地位,并导致生育率进一步降低。比如在以男性养家糊口模式为主导的社会,政府育儿津贴可能只是放进了丈夫的皮夹子,这反而强化了女性对于丈夫的依赖。<sup>③</sup>

一些性别研究者关于工业社会中男女角色的不平衡发展,即“未完成的性别革命”和“不平等、停滞的性别革命”的论断与麦克唐纳的性别公平理论异曲同工。<sup>④</sup>市场经济对于市场劳动的酬劳往往远高于社会对于社会再生产的补偿。对两种劳动不平等的激励机制,极大影响了女性个人就业和组建家庭的决定。<sup>⑤</sup>当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而家务分工没有出现与之相适应的变化时,会导致职业女性下班回到家中还要轮值“第二班”,即从事家务劳动和履行照料职责,<sup>⑥</sup>从而增加女性的压力和负担。英格蘭德<sup>⑦</sup>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女性从事的有酬市场劳动的贬值,加之家务劳动往往无酬并被贬低,促使女性积极参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有酬劳动,特别是高薪行业,而男性则在传统女性领域(包括低薪女性行

① Karen Oppenheim Mason, “Gender and Demographic Change: What Do We Know ?” in Gavin W. Jones et al., eds., *The Continui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158-182.

② Peter McDonald,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vol. 17, no. 1, 2000, pp. 1-16.

③ Peter McDonald,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6, no. 3, 2000, pp. 427-439.

④ Frances Goldscheider, Eva Bernhardt and Trude Lappegård,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1, no. 2, 2015, pp. 207-239; Arlie Hochschild and Anne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12; Paula England,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and Society*, vol. 24, no. 2, 2010, pp. 149-166.

⑤ Peter McDonald, “Demographic Life Transitions: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Paradigm,” *Health Transition Review*, vol. 6, 1996, pp. 385-392.

⑥ Arlie Hochschild and Anne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12.

⑦ Paula England,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pp. 149-166.

业)尤其是家务和照料劳动方面驻足不前,从而加重了女性的双重压力。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和家务负担是相互影响的。女性主义学者的分析指出了公私领域分离和互动是性别不平等的机制所在,而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则是矛盾的集中表现。按照这种思路,一方面女性家务、照料负担可能成为雇主性别歧视的借口,另一方面,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会负面影响甚至抑制女性的婚育动机。

比较上述理论可以发现,正是市场经济下公私领域的不同制度设置遵循不同的逻辑,造成了这些制度设置之间的不协调,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面临较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而这种冲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婚姻动机和生育决定,也影响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待遇,从而形塑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发达社会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现象。但这三个理论都是基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象,市场经济体制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其社会情境基础。

考虑到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历程和社会经济背景,上述理论的局限是均未考虑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明确阐述经济发展因素。与先于中国步入低生育率时期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发生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时,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韩国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两国当时的城镇化水平均接近80%。而中国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目前人均GDP仍不到万元,城镇化水平刚超过50%。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而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对经济发展有不可或缺的贡献。因此在考虑生育问题时,不能脱离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主要社会矛盾,需要既有社会性别视角,也有经济发展视角。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综合视角审视、分析和判断中国的低生育现象,不仅有利于更为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低生育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也有利于对调整生育政策效果作出更为切合实际的判断。采取综合视角还能避免在低生育率下只考虑女性的社会再生产角色而忽视了她们的物质生产者身份,从而有助于制定精准有效的配套政策,降低对女性社会经济参与产生负面作用的风险。

#### 四、从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理解中国的低生育率

回顾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历程和国际低生育率现象与应对情况,我们看到,在低生育率社会中,影响生育的因素更为多样和复杂,需要综合多维视角加以理解和分析,否则即使政府有决心并采取强大的政策干预,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我们需要汲取一些国家为应对低生育率现象出台政策多、投入多但收效甚微的教训,

同时也不能脱离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植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情境和生育率逐步下降的历史，批判性地整合国际人口学界和性别研究的制度冲突、性别公平和女性主义关于公私领域分离的理论，我们进一步融合经济发展视角，提出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综合性视角理解中国的低生育率、审视相关政策和措施。

### （一）性别平等、经济发展和生育状况的综合考察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强调从影响女性生育动机和行为的结构性因素入手，突出中国女性在生育率变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关键着眼点。具体而言，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公私领域出现分离，而两者的分离和互动形塑了同时拥有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女性的双重负担，并激化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一方面她们在家庭中的动机、成本和行为影响生育结果；另一方面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动机、成本和行为也影响劳动生产潜能的发挥和实现，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和动机，从而影响生育率变化。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既需要育龄女性作为成熟的劳动力充分地发挥她们的劳动生产潜能，也需要其进行未来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正是基于上述分析中女性作为物质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的双重属性和她们在公私领域的双重身份，我们的视角才得以全面、综合考察性别平等、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张力，并把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平衡和协调这三者关系的关键着眼点。国际低生育率理论也表明，正是性别平等在公私领域的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

借助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视角理解北欧和英法等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到，性别平等在公私领域的协调同步推进，有利于女性全面、高效地参与劳动力市场，而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有助于其在私人领域中家庭地位的提升，从而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协商和决策权力，促进其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分担其家务和育儿、照料负担，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就是说，女性在公私领域地位的提高可以互为促进，良性循环，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帮助维持一定水平的生育率。换言之，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均有正面影响：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也对育龄人群自主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有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保持相当水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更为接近个人生育意愿的生育率。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并未如传统人口学预言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而是持续下降，进入低生育率社会。但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低生育率社会，一

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水平，而有些国家则有明显回升。社会性别视角恰恰提供了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这种复杂关系的中间链条：正是在社会上、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家庭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造成了女性面对尖锐的工作—家庭冲突，导致单纯发展经济并不能扭转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形势；而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会形成多方分担女性的社会再生产的政策和社会机制，不但在充分发挥女性劳动者生产潜能的意义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也降低了女性生育的负担和机会成本，促成生育率的回升。

综合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理解生育率变化，在宏观层面需要考察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劳动参与和性别规范，在家庭层面需要分析家庭需求以及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和决策过程，在个体层面则要考虑到女性和男性的观念、动机和生育成本；而同时这三层机制不能割裂开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公私领域、宏观—微观的辩证互动关系，重视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的家庭职业动机的塑造，以及个人的生育和事业发展的相互影响，比如职场的性别歧视和不支持育儿的工作制度与工作环境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这种多层综合视角有助于客观分析中国生育率转变历程的不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国生育率从高水平迅速下降，除了国家对计划生育的大力提倡和避孕节育服务在城乡的普及，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普遍的劳动参与、在家庭内协商能力和参与家庭决策能力的提高和自主意识的增强，都起了重要影响作用。而在生育率降至低水平后，影响机制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和社会服务支持的退位以及支持育儿政策的缺失，“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持续，加之生活成本、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的升高，都对女性的生育尤其是二孩生育起到了抑制作用，而因生育中断甚至退出劳动就业的女性逐渐增多；同时，推迟结婚和生育也成为21世纪的突出现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女性普遍参与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生育率下降的重要背景，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人口从高生育率阶段向低生育率阶段转型，尽管私人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依然保留，但是单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女性的经济劳动（物质生产）和家务及照料劳动（社会再生产）整合起来，从而多少缓解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而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低生育率阶段向更低的生育率转型，特别是随着公私领域分离的加剧，照料等社会再生产责任回归个体家庭，并主要由女性承担，因而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大大激化，严重影响到她们的生育动机和成本。所以在低生育率持续近20年之后，以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审视全面两孩政策前后的生育情况，可以看到，当其他抑制生育的因素都没有改变时，仅放宽生育政策，在短期内只能释放有限的生育潜力，不会对长期生育率变化有明显的影响，同时由于育儿与工作的冲突，女性中断工作的风险升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期，使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

平应成为公共政策的重点。<sup>①</sup>

## （二）政策推动、社会参与和性别规范的齐头并进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从粗放型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向知识型、服务型、创新型经济升级转型。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已与男性齐头并进，且在服务型经济和小微经济中的创造力初露端倪，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在我国公私领域性别平等水平不同步的情境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要奋力竞争，在家庭领域里还要担任繁重的家务和照料养育责任，从而承受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其后果可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劳动生产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在私人领域则出现晚婚、不婚、婚育推迟，以至生育率低迷的状况。这种状况一旦出现，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急需有效扭转。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关注女性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女性全面参与社会活动和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女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解决家庭育儿的后顾之忧，成为当务之急。科学、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可以推动性别平等、经济和人口转型的良性协同发展；在全社会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摒弃传统儒家父权思想和家族主义思想，则是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意识形态基础。

### 1. 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

在政策层面，将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纳入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将有利于建立有效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机制。国际研究表明，那种一般性的、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不但收效甚微，还可能强化传统家庭模式。例如在私人领域依然维持传统性别分工的情况下，现金育儿补贴或延长女性育儿假的做法，可能对女性就业或事业发展有负面影响。一方面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丈夫，另一方面，女性较长期的职业中断使其很难在重返职场时，找到适合其教育和技能水准的职业。只要女性被期待更多地履行育儿责任，她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就会受到牵绊。其结果可能既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又抑制了生育率的回升。进一步，由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和照料的职责，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家庭政策，会造成女性群体的分化。一方面有可能把部分女性进一步推向家庭，抽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不愿意放弃个人事业发展的女性则有可能推迟甚至放弃婚育。日本和新加坡实行了相对长期、综合的家庭友好政策，但迄今尚未能有效促进生育率的上升，这与社会性别视角的缺位从而难以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无关联。所以对国内在支持育儿配套措施的讨论中有关提供现金补贴或延长女

<sup>①</sup> 吴帆：《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性育儿假的建议，需要以综合的视角审视，不应单独依赖一种模式。而缺乏性别视角考量的单纯现金补贴不会改变家庭传统性别分工模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育动机和成本；从提升生育率的效果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单纯现金补贴的作用不大。<sup>①</sup>对于延长女性育儿假，则需要综合考虑家庭的育儿需求和安排、女性的自身职业发展和选择、就业保障和工作制度以及用人单位的接受与配合程度。如果对这个问题缺乏综合考虑，那么仅延长女性的育儿假可能会导致女性的育儿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上升，也提高了女性用人单位的成本，从而加剧了女性就业风险。

## 2. 多元参与的社会机制

在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下，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不仅是女性的责任，更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界和男女两性的多元主体参与和分担社会再生产的责任。鉴于女性在公私领域的双重身份，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同时考虑政府、社会、企业和家庭各方的角色和参与。在此需要更进一步阐述男性和企业界参与的重要性。首先，鉴于女性积极争取进入传统上男性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却不愿意进入传统女性的低薪领域和无酬家务劳动的现状，男性参与实际上可以成为在私人领域建设相对性别平等的家庭模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有助于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和促进女性生育意愿的实现。而私人领域性别平等的进步也将有助于公共领域性别平等的进步。如关于OECD国家低生育的研究发现，在以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支撑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为主体的社会中，生育率最低。<sup>②</sup>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普遍面临的歧视，应当考虑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性别平等的政策举措和推动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传统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下，企业的运作往往和家庭及育儿的需要相冲突，而维持这种运作的基础，主要是女性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个人发展，承担更多家庭负担和育儿责任。这种运作会导致女性被认为是经常要请假和工作效率较低的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提倡男性参与家务和多元家庭模式，提倡家庭友好政策减轻女性的负担，使女性可以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成为和男性一样有效率的员工。当然，企业有效执行具有性别视角的家庭友好政策和弘扬性别平等文化，离不开政府严格细致的立法、执法和监管。在政府、社会、企业和男性的共同参与下，支持女性高效参与经济活动，平等参与家庭生活，既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① Melinda Mills et al., "Why do People Postpone Parenthood? Reasons and Social Policy Incentives,"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vol. 17, no. 6, 2011, pp. 848-860.

② Mary C. Brinton and Dong-Ju Lee, "Gender-Role Ideology,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Post-industrial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2, no. 3, 2016, pp. 405-433.

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生育率。

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我国各省都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并明确规定了妇女产假和男方的“陪产假”或“护理假”，这是有利于保护女性健康并推动夫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举措。但同时还需要看到，大部分地区规定的男方假期只有7—20天，少数省份规定25—30天，因此这个假期目的只是基于产妇的照顾需要，从假期的名称也可以看出这并不是父亲育儿假（paternal leave）。此外，在招聘时询问女性应聘者的生育状况等现象表明，社会上存在一种潜意识或共识，即育儿仅是女性的责任。如果这种意识不改变，仅通过办托儿所不能有效解决女性想生而“不敢生”的问题，因为幼儿的照料在托儿所之外依然大量存在，并将主要由女性承担。

### 3. 性别规范的持续现代化

从意识形态上摒弃传统儒家父权思想和家族主义思想，是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文化基础。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倡导男女平等价值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只有充分、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及其背后的性别意识形态，才能完整地理解并有效解决低生育率难题。如果仅强调提升生育率，而缺少配套经济社会政策举措和制度设置，不去挑战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只会加剧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其结果是，一方面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下降，而另一方面家庭的组建（包括结婚和生育）会受到负面影响，东亚社会中普遍的晚婚、不婚现象就是例证。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更是我们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落后腐朽传统观念的先进武器。只有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持续、细致地推进性别规范的现代化，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并坚守性别平等的底线，才能使传统儒家父权思想成为无源之水，使市场歧视成为无本之木，真正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

## 结 语

国家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而“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sup>①</sup>在生育政策调整后，中国社会在努力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同时，必须在不牺牲女性在公共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发

<sup>①</sup>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3/c\\_1117029621.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3/c_1117029621.htm)，2017年3月2日。

展。为此，需要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低生育率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评价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在考虑女性的个人发展和家庭组建动机的同时，政府和社会应积极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和性别平等建设，同时以法律和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歧视，鼓励男女两性全面、平等地参与家庭生活和物质生产。

在讨论低生育率问题时，支持家庭生育的配套措施已经受到重视，但是配套措施的设计不仅要着眼于支持生育，还要能够缓解照料负担，保障女性就业。尤其要关注到计划生育二孩的女性很可能要面临更大的牺牲个人职业发展的风险，或者要接受没有前景的工作，甚至不得不离开劳动力市场。那么，在缺少制度支撑的情形下，拥有丰富劳动经验和人力资本的成年女性劳动者被迫回家，或从事远低于自己资历的工作，她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会大打折扣，从而大大削弱我国应对劳动力减少和快速老龄化挑战的能力。而家庭中女性收入的缺失或下降又会降低家庭整体收入，从而影响个体家庭的生育决定及对下一代的投资和培养。

鉴于目前家庭中的家务、育儿、照护老人主要由女性承担，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有效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的长效机制，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可能会陷入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之中。当未婚女性意识到其未来的家庭角色会影响个人发展时，她们可能放弃组建家庭。比如在韩国和日本，男性养家糊口、女性操持家务的模式，连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设置以及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不仅导致女性不愿意结婚生育，也使得男性难以进入婚姻、组建家庭，<sup>①</sup>即与性别平等密切关联的低生育陷阱的社会性后果将由两性共同承担，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平衡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花巨资、长期进行各种政策干预，却难以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进一步提醒我们应具有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

在我国生育率长期走低的同时，社会上一些提倡传统性别观念、呼吁女性回家的论调重新抬头。为此，我们必须客观评价中国女性在人口转型、生育率下降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中国女性大规模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女性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均发生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阶段，高素质、大规模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了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有效释放生育潜力，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和评估应该综合考虑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同时，鉴于很多关于西方和东亚社会的家庭政策和低生育研究发现，单一的家庭政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往往有限，并难以评估；而一个社会整体的制度结构、女性的经济参与、文化

<sup>①</sup> Mary C. Brinton and Dong-Ju Lee, "Gender-Role Ideology,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Post-industrial Fertility," pp. 405-433.

环境和性别规范往往对生育产生系统性作用。<sup>①</sup> 所以，系统的政策设计要和公私领域性别平等的协同进步以及倡导性别平等规范齐头并进。在制定、调整、完善和评价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应当避免仅关注人口指标，将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现象剥离的做法，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

出生人口数量、生育率以及其他人口指标变化，无不受到深层次的机制和因素影响，并非是对政策调整的机械回应。我们强调在当前形势下从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重要性，期待由此推进对人口现象背后复杂的结构性背景和影响机制的理解和分析，进而启发和充实更多实证研究。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因素本身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机制，本文所提出社会性别和发展的综合视角仅是理解生育率的多维视角之一，其解释力亦有待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和丰富。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辑：冯小双〕

---

① Anne H. Gauthier,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 26, no. 3, 2007, pp. 323-346; Anne H. Gauthier, "Socia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in Naohiro Ogawa and Iqbal H. Shah, eds., *Low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East Asia*, Dordrecht: Springer, 2015, pp. 11-30; Olivier Thévenon and Anne H. Gauthier, "Family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 'Fertility-booster' with Side-effects,"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vol. 14, no. 2, 2011, pp. 197-216.

means of modernizing law and its own pathway to the choice of legal integration. Its basic orientation of legal change has rich innovative connotations and a clear practical direction.

**(5) The Goal of Case Analysis: From Story to Knowledge**      *Zhang Jing* • 126 •

The Chinese academic world still lacks systematic standards for what, in the end, should be done with case studies. Debate over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case study (qualitative) and statistic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is always at the level of method, standpoint and themes; it has yet to receive an analysis that accords with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research objectives. The goal of case analysis is not to tell stories, but to generate knowledge, so one must follow the general logic and principles commonly observed in cognitive activities. Case analysis can provide more than one type of knowledge; for example, it may include interpretative knowledge (of causes), understanding (of characteristics) or normative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case studies is not in an opposing relationship wi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but in a complementary one. The uniqueness of the case study has to be associated with general knowledge, so that specific cases can be compared with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e of the strengths of case studies is that they can systematically exhibit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in the end, scattered and diverse independent cases can make sense just because the knowledge they produce represents incremental progress in the relevant knowledge system.

**(6) China’ s Low Fertility 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

*Ji Yingchun and Zheng Zhenzhen* • 143 •

In order to gain a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gree of acceptance, the influence and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nd the long-term trend of Chinese fertility rates, one must star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combining the social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soc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China’ s low fertility. If, bearing in mind international theories and lessons, we examine China’ s low fertility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we find that the key lies in the work-family conflict experienced by women. Devising public policies from a social gender perspective and encourag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lay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society, business and both sexes, is a social mechanism for alleviating such conflicts, and promoting the Marxist gender equality ideology and abandon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 patriarchal ideas and familial thinking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ir alleviation. Given women’ s dual roles i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romoting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alleviating women’ s work-family conflicts will make a

• 207 •

positive contribution both to maintaining a certain fertility rate an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7) Changes in the Text of the *Sao*-style *Fu* (Rhapsody)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from Loss of the Modal Particle *Xi*** *Lin Xiaoguang* • 162 •

In the existing *fu* poems of the Former and Later Han and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sao*-style *fu* marked by the modal particle *xi* (兮), and the non-*sao* style *fu* without the modal particle *xi* existed alongside those in a middle form. Previously, scholars tended to interpret this phenomenon as a creative technique, seeing it as a sig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fu* style. However, returning to the source of records of extant literature for a textual comparison of methods of treating these texts since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ne finds that quite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six- and four-character *fu* are in the half-*sao* or non-*sao* style, because the modal particle *xi* has been omitt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n the course of copying and cataloging. This can be checked against such major literary classifications as Tang and Song encyclopedic works, Han and Tang histories, and the Mid-Song collections of ancient writings. The proportion of *sao*-style *fu* to the the Han and Jin *fu* should be higher than what is seen by later generations. The misleading appearance of existing texts affected earlier categorizations of *fu* styles and associated views, necessitating a reexamination and review of the subject. Some of the altered texts can be restored, which may give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fu* genre a new look.

**(8) Systemic Innovation in the British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 Ruiying and Yang Song* • 183 •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was crucial to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and a cornerstone of its socioeconomic prosperity. Systemic innovation was a key feature in the industry's rise; its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interactive model of innovation represented a new 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certed effect of these innovations enabled the industry to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echnical innovation raised labor productivity; the new factories enabl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innovations in credit financing solved the emerging industry's capital problem;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not only controlled the sources of raw cotton supply, but also opened up a series of new markets; and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made possible new combinations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encouraged the synergy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Systemic innovation was the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cotton textile industry.